

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自主招生需修正“跑道”

■本报记者 温才妃

高考改革能否成为创新型人才选拔、培养的转折点,一直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去年,北京率先推出高考改革方案,紧接着上海、浙江也颁布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改革试点方案。随着改革的脚步趋近,近日教育部要求全国各地制订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并于6月30日前报教育部备案。

那么,高考改革的重点应落向何处?自主招生改革尚有哪些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解决?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

高考改革重点在招生

《中国科学报》:2014年,上海、浙江等地公布了“3+3”高考方案。今年6月底之前,全国各地新高考改革方案也将报教育部备案。通过这些改革,您最希望哪些问题得到解决?

程方平:高考从1977年恢复以后,在内容和方法上的探索一直都没有停歇,如自主招生、高考内容调整、区域性的自主命题等等。通过这些年大家的反映,考试部分的改革在社会上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

改革源于问题的存在。过去我们笼统地说高考有很多问题,其实当中最大的问题是招生。考试环节,特别是全国统考的制度建设还是不错的,出现漏题事件通常都能被快速处理。但是在招生环节,相关制度的建设仍是软肋,这些年高考招生环节揭露出来的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就是最好的证据。

《中国科学报》:我们知道招生环节最受争议的是自主招生,请问自主招生的争议是怎么产生的?

程方平:很多人认为自主招生是新事物,其实不然。1977年以后,很多探索都是围绕着自主招生进行的。自主招生的比例长期维持在2%~5%。主要是为了争取音乐、美术、体育方面的人才,谋私利的情况相对较少。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种“纯粹”随着物质丰富、制度建设没跟上被打破。

随着高校扩招,2%~5%的自主招生比例反映在人数上也翻了几番。例如,1万人的大学扩充为3万人,按2%的比例计算,自主招生的人数就由原来的200人变为如今的600人,而我们有近两千所公私立的高校加入自主招生,使得自主招生生的总量迅速扩大。

加之现在自主招生的制度仍然不清晰,如信息不够公开全面、监督惩治不力、作弊不构成违法且成本太低、发现问题无明确反映通道,尤其在自主招生方面,各高校更是缺少相应具体、严格、禁得起监督的制度保障,从而导致高考在信用上受到了很大伤害。

记者快评

贺卡需要附带成绩单吗

对于大学生来说,这个史上“最长寒假”可谓惬意。与中学相比,进入大学后的学业压力减轻不少。成绩单、家长会这些词汇对于绝大多数大学生来说都已经成为历史。然而,武汉部分高校的大学生却没有那么幸运,学校会陆续通过信件、电话、短信等方式向家长反馈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于是有些人的这个春节,可能竟没那么好过了。

“有的学校还在学生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家长邮寄新春贺卡,附带其期末成绩单;有高校要求家长在成绩单上签字,辅导员还将进行电话确认……”这样的意外贺卡,虽然是寄予了学校对家长的新春祝福,但更多的还在于向家长通报学生在校学习情况,和中小学时期末发给学生的成绩报告单并无二样。

部分学校称,这是本着对学生、家长负责的原则和立场,希望让家长了解自己的孩子在离家的情况下,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话虽如此,但笔者认为,此举大略并无必要,就全国的几千所高校而言,向学生家长寄送成绩单的高校并不多,也从侧面证明了这点。

就大学生而言,学习虽然还是学生的本职工作,但人际交往、社会活动乃至实习、实践等其他方面能力也都十分重要。如果说是希望向家长提供学生在校情况报告,让家长了解孩子状态,那么只提供学习成绩单似乎不够全面,也没有必要要求家长在成绩单上签字,更别提“辅导员还将进行电话确认”这种不知所云的滑稽行为了。进入大学后,家长们都会给予学生更多的信任和自由,学校就更不应该以对待中小学生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普遍都已成年的大学生。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断言向家长寄送成绩单并无必要,并不代表笔者认为大学生的学业就不值得重视。许多高校都有对学生学习成绩的硬性要求,“挂科”“留级”“退学”等情况都有不同要求,在学生学习成绩确实堪忧的情况下,学校当然有必要向家长知会,但这只是特殊情况,而非普遍作法。

回到“新春贺卡”事件本身,笔者倒认为,高校以贺卡形式表达对学生家庭的新春祝贺,可以让家长感受到来自学校的关心,的确是值得提倡的行为。不过,学校可以考虑把这份贺卡以更温馨、活泼的方式呈现,而非附上一份冷冷的期末考试成绩单,相信如此会取得更好的沟通效果。

呼唤《考试法》推出

《中国科学报》:如何规范自主招生,对此您有何建议?

程方平:多年来,我一直在建议出台《考试法》,把国家评价人才、高校选拔人才的标准、制度和法规加以规范。

为什么高考招生的问题屡禁不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过去酒驾被定性为“违规”,使得酒驾屡禁不止;后来酒驾被定为“违法”,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好转,现在人们也逐渐养成了喝酒不开车的习惯。然而,我们的高考至今没有相关的法规出台。民国时期,设“五院”管理国家,考试院和行政院是平级的,政府把人才和人力资源看得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也很“重视”考试,但是无法可依。无法可依导致很多重要的改革推行不下去,一推就乱,不推又无法进步。

仍以自主招生为例,从恢复高考之初就有自主招生,当时的教师到考生所在地区面试招生,视学生的潜力与以后教学的问题,在严格监控的情况下与考生交流,并决定录取。如今虽然实现了网络化、信息化,但是信息公开与监控并没有做好,这容易引起社会上的质疑。

在我看来,针对自主招生被录取的学生,首先要公开统考、说明招生理由、注明由谁做了招生决定。而且,招生决定要与诚信记录相关联,如果以权谋私,应该给予相应的诚信记录惩罚。久而久之,风气就会转好。

另外,招录一个人与否,还要经得起推敲。录取一个成绩不如他人的考生,应该允许他人有质疑和查询的权力,自主招生的高校也应该建立起相关的监督机制。同时,面对录取的争议,教育主管部门和招生高校还应设立一个评价或审议的机构,进行最后的裁定。

《中国科学报》:您的规范建议是围绕着《考试法》提出的,为什么至今仍未有相关法律推出?

程方平:这也是让我感到奇怪之处。一部法律的出台最初并不一定完善,可以先设要点,逐渐添加,奇怪的是中国就有许多重要的教育法律不存在。

据我所知,我国立法的人员多属兼职,国外一般为专职议员,所以立法通常一推多年。在立法的过程中,需要有行业人才加入,国家认为教育的事由教育部门拿初稿,殊不知,看起来是教育问题,背后却是政治、经济、人事、社会等问题的综合,需要社会上各方面人士参与。另外,由于行业协会多数行政化,行业代表也未必能代表行业,这就需要国家在立法人员的选择上加强甄别。

就《考试法》而言,我认为契约法较容易实

“ 高考招生的问题屡禁不止,原因在于我们的高考至今没有相关的法规出台。无法可依导致很多重要的改革推行不下去,一推就乱,不推又无法进步。

现,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也许现实与每人的期望并不符合,但是经过商议容易实现现阶段最广泛的认同。

高考改革并没有否定自招联盟

《中国科学报》:去年底,三大自主招生联盟解体,有人为自主招生中的“掐尖”问题庆幸,有人担心自主招生改革受到冲击。您是怎么看待联盟解体的?

程方平:不加入联盟高校也会“掐尖”,因为政府给自主招生高校的资源是其他学校没法比的,不联盟只是掐尖没有这么顺畅。实际上,掐尖从高考自主招生之前就开始了。

联盟的初衷是为了减轻高校负担,这种形式并没有问题。其实高考改革并没有否定联盟,联盟解体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人利用自主招生营私舞弊。自主招生在高考之前进行,更容易出问题,因为对相关决定者(如高校招生人员、中学校长等)的监督不易把控;在高考之后相对较好,但同时也存在着不易监督的风险。

没有法律评判,单从经济和道德的角度评判,本身就很乏力。如今自主招生联盟解散的原

看不大懂的上海高考“选考”

■胡乐乐

春节前,上海37所普通本科高校公布了2017年高考选考科目要求。“选考”是上海市2017年高考改革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即要求招生高校根据办学特色和定位,以及不同学科专业人才培养需要,有针对性地对接报考本专业学生提出选考要求。选考科目包括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6门课。学生最多可参加其中3门科目的考试。

由于我国不像美国等国实行高校学生二年级下学期或三年级上学期再确定专业的制度,而是一入校就确定或基本确定了专业,所以专业选考是确保所录取的学生能够适合所学专业的必然之举。除此之外,高考选考制度大大有利于减轻学生的高考备考压力,让他们能够在自己最擅长的几个科目上更好地施展特长和才能。正因为如此,所以上海市的这次改革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

但意外的是,从目前公布的2017年高考选考科目要求来看,这项有重大价值的选考制度还没有得到高校的较好对待。首先,一些高校在确定专业时,显得很随意。例如,复旦大学的“社会科学试验班”和“法学专业”居然要求考生选考物理,“经济管理试验班”居然选考物理和化学。其次,许多高校的专业竟然没有设定选考科目,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汉语言文学”“法学”“公共事业管理”等。这是否意味着物理、化学、生物好,而历史、地理、政治等文科方面差的考生,也可以报考这几个专业?

还有一些高校消极应对,全校众多专业中,居然连一个选考科目的专业都没有。这些高校之所以不公布专业选考要求,难道是因为怕一旦有了选考的限定,生源就大大减少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高校就得加快改革了。

在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两国,高校几乎每个专业都对报考的考生有选考要求——明确规定必须考哪些科目的组合。而



■何雪莲

因,更多的在于高校认为当前的政策和制度不明朗,他们也在期待一个好制度来保障高考招生的公平。因此,出台《考试法》,给高考规定更细的说明与界定,对高校也是有帮助的。

《中国科学报》:我们看到自主招生移到高考之后进行,它又有哪些新的隐患?主管部门、高校应该怎么办?

程方平:把自主招生放在高考之后,时间相对较短,招生过程中是否公平、科学,由谁来监督将是一个明显的问题。

在自主招生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我们的大学校长是名义上的法人,但是真正出了问题,他不用为此负责。如果出现招生舞弊的问题,责任是招生办和主管副校长的,似乎与高校及校长并无关碍,制度的改善仍不能到位。即便是各校纷纷出台的章程,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按规矩做事,法律一方面约束人,一方面也在保护人。我们把法律比作一条跑道,运动员在跑道里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别人来干扰你,他就违法违规了。现在跑道出了问题,运动员在跑步时看到跑道交叉了,连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跑下去了。因此,修正跑道,明确立法,当是推进高考改革的眼下之需。

且韩国和日本高考还将许多大科目分为难度不同的三个小科目。比如,韩国高考的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球科学、科学就分为“Ⅰ”和“Ⅱ”。因此,同样是考生物,顶级大学国立首尔大学生物专业的考生必须考难度大的“生物Ⅰ”,而一般的地方大学则可能只需要考难度小的“生物Ⅱ”即可。如此确保了韩国和日本高校能更准确地物色最终适合自己专业的最优秀的学生。这方面,上海高校应该好好学习,并且上海教育考试院应该将所有科目都细化为难度不同的“Ⅰ”和“Ⅱ”两个小科目,以利于高校更为准确地选拔人才。

总而言之,从目前已经公布的的选考科目情况来看,我们不仅不大容易看得懂,而且还发现上海不少高校消极应对2017年高考选考。选考既有利于高校,也有利于考生,因此高校必须认真做好这项重大工作,切不可懈怠,更不可没有科目要求。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师)

高教观点

书籍必定自动地把理解它的人从不理解它的人中分出来,大学中的智识传播也必然如此。老师不可能,也不必敲响每一面鼓。最出色的猎狗只能将猎物赶进猎人猎枪的射程里,如果他不开枪,猎狗也无能为力。大学老师就像这个意义上的猎狗。在所有学科领域里,都存在诗人和管道工两类人群。诗人气质的学者大体是在为了获得同行的尊敬而工作,他们的自尊中就包含着被同行尊敬的成分。但这类象征资本,对学生来说可能一钱不值。对学生来说,老师与柏拉图山洞里那个坚决拒绝回心转意的囚徒可有一比,他们一本正经置身其中的那个世界的景象即使不是荒诞不经的,也是不值得留恋的。

学生身上得体 and 严谨的意味在减少,他们的热情与骄傲散发出自恋和自吹自擂的气息。在光纤时代的课堂上,学生发短信、聊天、接电话,埋头做自己的事情,或者随时退场。老师视界清明,但无能为力,这是一种智识民主吗?当然不是,这只意味着老师,或者说智识的权威性在光纤时代进一步衰落了。悲催!当老师像他的学生那样蹦出这两个字时,他品尝到了一丝羞辱感。

的确,一些光辉的句子: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大学是风向标……也许只有在大学拥有一大批洞穴囚徒的意义上才光芒万丈。但是,强调大学洞穴囚徒的价值并不意味着他们自动就获得了合法身份(合法身份需要拿出手的劳动成果加以证明),而是说大学洞穴囚徒与其他任何一类人一样,都有其价值(他的价值在于保持对思想的强烈专注)。反过来,无论是管道工还是诗人,或是其他任何一类人,都不会被认作比他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都不会比他人更能作为样板。这一意识,大学洞穴囚徒必须越早树立越好,否则非常容易陷入失败天才的伤心之地。

将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学者期望借助互联网传播思想,同时有越来越多的民间学者与之一争高下。任何一个稍具野心的学者都意识到,必须同时掌握两种写作风格——学院方式与通俗方式。互联网的通讯教育效果使人见多识广,结局必然是水涨船高,人们会更加挑剔,也更加务实;没有哪种智识或理论可以包打天下。无论大学本身愿意与否,光纤时代的人们将倾向于将大学视为陈列各种智识观念的大型超市。在观念的超市里,智识林林总总,像商品一样陈列,务实的人们挑剔地检视五花八门的商品,人们(包括普通读者、批评家和学者)将按质论价,权衡是否要将其放入自己的购物车。

所谓按质论价,首先是对完成手头目的的合适性来评价(理论被视为对实践的辅助,而不是相反,把实践看作理论退化),其次依照其创造性和难度而定。尽管严肃的思想可以由轻浮的方式加以表达,但思想本身是困难的;尽管一幅梵高的仿作可能比原作更耐看,一本解释老子的书可能比老子自己说得更清楚,但无论怎样精致的抄袭依然是抄袭。卢梭主义严重违反常识,互联网上形形色色自以为是的创造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抄袭。把自由表达当成思想和创造力的证明,这是光纤时代一个相当普遍的错觉。人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如腹泻一样的欲言又止、挤眉弄眼、装腔作势以及不引起关注决不罢休并没有多少创造性的成分。在光纤时代,面对过眼浮云,人们将认死理,物以稀为贵。创造是更难的,而难以做到的东西相当于稀缺的东西。大学作为智识中心,仅仅是因为它有能力生产真正有原创力、有深度、有力度的智识。

当这类智识商品极大丰富之时,也是我们解放想象力、拓展可能空间以及减少局限之际。这样一个因特世界比以前的任何一个社会更复杂、更发达、更多变、更有趣,首先是更灵活。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学者只会迅速走向坟墓。在光纤时代,大学接到一个明确的命令:决不能封闭对话的道路,要商议、讨论、说服、争论、较量,从而自我纠正。在此意义上,老师不过是经验更丰富的学生,大学将因此成为一股极端活跃又进取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于,谁来资助这些项目?

“如果你正在寻找更高层次的合作,你需要在印度政策和法律规定的研究合作框架内,看看有什么限制。”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国际招聘经理斯图尔特说:“这些事情目前看来都不清楚。”

印度—英国先进技术中心(支持印度、英国两国在电信工程方面协作的博士研究项目)是两国成功建立合作的第一个成果,成立于2006年,而这并不容易。该项目领导者杰拉德·帕尔教授说:“英国并不是印度许多学者的首选合作伙伴,他们大概排在第八、第九的位置。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没有资金来维持合作。”他补充说,英国将不会是印度考虑合作伙伴的理想选择,除非英国直接把钱放在桌子上。

(作者供职于英国《卫报》,本报记者韩珉编译)

更活泼的大学(下)